

精神的魅力

——追思冀淑英先生

陳紅彥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冀淑英先生在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及其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書目的畢生業績，追思了她宏富的學術成就、勤懇的工作經歷和感人的精神魅力。

關鍵詞：冀淑英 善本古籍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冀淑英，生於1920年2月，2001年4月1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倏忽十年，後學晚輩在對先生的追憶中，在其精神魅力的感召下，正在讓先生一生熱愛並為之奮鬥的古籍事業蓬勃向前，願能告慰先生在天之靈。先生十周年祭，追念曾經的言傳身教，期待更深的感悟，更多的教益。

一、深厚積澱來自日復一日的具體工作，來自勤懇的實踐

冀淑英先生把“為學不作媚時語，實踐方能出真知”作為她的座右銘，值得今天的年輕人細細品味。先生作為版本目錄學的大家，能夠在業界一言九鼎，成為高山仰止的人物，的確是基於幾十年扎扎實實的善本編目、版本鑒定實踐。

1948年，冀淑英先生在完成北京大學李盛鐸專藏的編目後，轉至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供職。此時的北圖是古籍收藏的黃金時期。抗戰勝利後，運至天津的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所餘九十二種售歸國家圖書館，鄭振鐸先生抗戰期間在上海孤島搶救採購的珍貴古籍也已經運抵國家圖書館，解放初期，國內著名的公私藏書，如瞿氏鐵琴銅劍樓、傅氏雙鑒樓、潘氏寶禮堂、周氏自莊嚴堪、常熟翁氏、涵芬樓等，或捐贈、或轉讓，明清以來累世寶藏如百川歸海，陸續入藏國家圖書館。際此嘉會，冀先生在趙萬里先生指導下，對這些古籍進行鑒定編目。歷代留存古刻名鈔，先賢墨跡，先生一一寓目，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編目後，先生建立一套包括書名目錄、著者目錄、分類目錄三部分的目錄卡片，幾年後規模初具，向讀者開放，為讀者查閱提供極大的便利。以這套卡片為基礎，1959年，國家圖書館的國慶十週年獻禮項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與此同時，另一個獻禮項目——由趙萬里先生主持的《中國版刻圖錄》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系統介紹中國雕版印刷發展的大型圖錄，冀先生協助趙先生選書的同時，撰寫了部分明清時期的說明文字。這部大型圖錄至今仍為最

權威的、研習版本目錄學不可或缺的參考工具書之一，影響之深遠，至今尚無可匹敵。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到1987年重編時，其主要內容仍是冀先生的這套卡片。這一段經歷是先生日後成為版本目錄學家的堅實基礎。

冀淑英先生與藏書家結下的深厚友誼，加之冀先生對珍貴善本古籍的珍惜和瞭解，讓許多藏書家將多年的珍藏放心地交給國家圖書館收藏。1952年，周叔弢先生將他藏書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書，共計715部（經周景良、李國慶、程有慶先生逐一核實應為726部），26712冊，全數捐給北圖時，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同志曾動情地說：“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而周叔弢先生選擇北圖作為其珍藏歸宿的原因，曾在對哲嗣珏良先生的談話中提及：“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手下又有他培養出來的如冀淑英同志等，書捐到那裏可謂得所，我是放心的。”受冀淑英等前輩的影響，現在善本部的工作人員依然遵從著愛書如護頭目的傳統，不忍心看到書受一點損傷。這種影響來源於前人以身作則的身教，也得益於冀先生對晚生後學的真切關心和愛護。1963年與王樹偉、朱家濂、馮寶琳為前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先生的藏書合編《西諦書目》（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為周叔弢先生藏書編寫《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也見證了冀先生對藏書家的尊重以及對古籍的珍愛。

1975年，周總理在病重期間指示“盡快把全國善本書總目錄編出來”。1979年，全國善本書總目的編委會正式成立。1980年開始，全國公共圖書館和其他藏書單位的目錄卡片開始彙集，整編工作正式展開。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先生出任主編，冀先生和潘天禎先生任副主編。這是中國千百年來未有之盛業，冀先生協助顧廷龍先生經營掌劃，為顧先生倚重。特別是項目進行的17年中，先生為保證目錄的準確性，走遍大江南北，將目錄卡片與原書一一核驗，其對版本鑒定之精，所見之廣，可以說罕有其匹。這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先生晚年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1986年至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筆者曾經在1989年前後在總目辦公室隨冀先生工作，對先生編製總目時的敬業、執著留下深刻印象。

先生得益於經眼善本數量之巨，其版本研究堪稱理論與實證兼顧兼擅，有其精到過人之處。先生認為鑒定一書的版本，不止分析辨別其刻板或抄寫的年代，還應進一步熟悉某書歷來傳世有多少版本，現在某本稀見，某本流傳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個本子的異同優劣，辨其版刻源流；並提出，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吸收前人的成果，多讀前人的目錄和序跋，一方面從書的本身條件來尋求解決的途徑；特別強調，所有可以斷定版本的因素，不可以孤立地看待和應用。這些觀點在先生為宋元古刻名抄撰寫的序跋中清晰地反映出來。在這些序跋中，她把一部書的版刻放在歷史的大環境下，“溯版本之源流，辨版刻之時地，糾前賢之舛誤，堪與顧（廣圻）黃（丕烈）相頡頏，而又遠過之。”（《冀淑英文集》王紹曾序）如在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寫的《律附音義》序中，根據書中刻工與同時代刻工的分析，證實書為南宋重刻天聖本，從而推翻了前人北宋天聖本的判斷。在為《常熱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影印說明》中又是根據與其他書刻工的比對、南宋初避諱不嚴等因素，將《集韻》先賢定為北宋仁宗刻本的結論

推翻，定為南宋初年明州刊本。

對此，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在2009年9月國家圖書館百年館慶時在《光明日報》上以“不讓鬚眉的版本學家——憶版本目錄學家冀淑英先生”為題撰文紀念冀淑英先生，對先生厚實的學問與鑒定版本的功力仰慕之至。特別提到當冀先生見到上圖藏宋刻十卷殘本《金石錄》時，脫口而出“該本與北圖的三十卷足本很像是一個本子”。而兩部書歷來版本學家都認為是兩個不同版本，陳先生對冀先生的判斷半信半疑，而1984年當陳先生將上圖本與國圖本悉心比對後證實兩本果為同一版刻，上圖本在明末已被人做了手腳，造成了兩本為不同版本體系的假象。冀先生不經意間將三百年來許多收藏家、鑒定家都被騙過的公案做了了斷。這是多麼深厚的功底呀！

2002年，我受命編輯整理《冀淑英文集》時曾經疑惑，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版本目錄學大家，論文為何不過二十萬字，卻被這個時代尊為版本學大家，在我把這些文章一一拜讀之後，被先生文章不寫半字空的真知灼見深深折服。先生的學術思想不僅僅反映在二十萬字的文章和論述中，更深刻地體現在她豐富的本目錄學實踐中。她一生編纂的公私藏書目錄，均為傳世之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堪稱前無古人。

由此想到，今天的年輕人，或許具備博士碩士學歷，卻輕視扎扎實實開展實踐活動，具體編目不屑去做，或者淺嘗輒止，不去總結鑽研，鑽進狹小的空間，進行所謂的科研，構築漂浮的空中樓閣，腳下無根，後勁不足，還能夠向前走多遠，令人擔憂。已不再年輕的我們，面對任務和名利，又有多少人能把持自己，摒棄驕動和浮躁，堅持文章不寫半句空，不出現一知半解的“急就章”？從對照中我們感到差距，也感到愧疚。

幾十年扎扎實實的編目鑒定實踐，古籍版本目錄學的建樹，高山仰止的權威，其中的對應關係越加明晰。

二、愛書護書源於高尚的職業素養，來自對古籍的摯愛

冀淑英先生一生愛書護書，為國家圖書館的古籍善本藏書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她不僅進行古籍的編目整理研究，也重視古籍善本的保護與修復。1949年《趙城金藏》入藏本館，她與趙萬里先生一起，研究搶救辦法，製定了“整舊如舊”的修復方案，至今仍是業界遵從的修復古籍善本書的基本原則。九十年代初，國圖大規模修整館藏敦煌遺書，先生又提出“搶救為主，治病為輔”的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獻的一切信息。這不僅得到敦煌學界的肯定，也為國際敦煌學界修復敦煌遺書提出了指導原則，同時推廣到其他珍貴文獻的修復和保護中。

不僅理論上卓有建樹，冀先生對古籍的熱愛也是發自心底的。冀先生對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年輕人的提攜幫助是毫無保留的。1997年，冀先生曾經給善本部的年輕人做過十餘次業務培訓，將她親身經歷的善本書入藏國家圖書館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包括藏書家的傳記、所藏書的遞承關係，以及各家藏書的特點，其熟悉程度，真可謂如數家珍。這些珍貴的活的歷史，善本部的同仁已經作為珍貴的檔案材料進行了錄音、

整理，並已隨著《冀淑英文集》的出版公諸於世，為世人共享。而她“為學不作媚時語，實踐方能出真知”的做人 and 治學的準則，正在為善本部的年輕人尊崇著，實踐著。對於好學上進的年輕人，冀先生關懷備至，慈愛有加，從工作到生活都給予無微不至的指導和關心。但是其前提是必須愛書，如果讓老人家看到某人對書不夠愛護，那拍著桌子的一頓訓話是免不了的。

記得一次老人家已經退休在家了，接了熟人的一通電話，說他到國圖查某一部書，前一次看到了，這次卻沒有看成，工作人員告訴他沒有。老人家對國圖的古籍熟悉的程度非同尋常，一聽急得馬上撥通電話，讓我馬上去查。這時已近下班，老人的女兒特別又補了一個電話來，說老太太怕電話聽不清已經帶好助聽器。於是我們和閱覽室的同事馬上下庫去核實，見書在架上好端端地放著。我趕緊回電話，感覺接到電話，電話線的另一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其實是接電話的時候老人家沒有帶助聽器，聽對方說話聽差了，一場虛驚。但是冀先生對書的熟悉和愛惜卻令人感動。

前幾天《新京報》上有一段丁瑜先生的回憶。他記得“文革”期間，在抄家的書中發現了很珍貴的《咸淳臨安志》的零葉。這些散落的零葉如果上交就可能會被當成廢品，於是冀先生偷偷地把它藏到辦公室裏，之後書被修復好後收入館藏。當時冀淑英已經被抄家、剃頭，在那種處境下她還能這樣關心和保護古籍，令人佩服。

三、嚴謹工作，淡泊名利

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熱愛事業，工作、治學嚴謹認真，樂於奉獻，卻淡泊名利，過著簡樸的生活。

我1987年到館工作後不久，被派到全國善本總目辦公室，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幫冀淑英先生做些輔助性工作，目睹了先生對事業的執著。一開始我們的任務是將油印本按照新排定的順序剪裁粘貼，並進行校對。當時我想這工作太機械，重複性強，沒什麼意思。先生卻不這麼認為，她給我們講做古籍的基本功要先記至少幾百個書名、著者等信息，幹活時一定要用心，而更嚴格的是，她在剪貼時經常過來巡視，條與條間留多少空隙，每條天頭地腳空多少距離，都親自指導我們調整，原因是貼清楚了、出版社排版質量纔會高，不然排版人看不出條目間關係，容易出錯。

最初工作地點在文津街，那時六天工作制，但是到週六，一些非一線部門經常可以提前下班，但是冀先生每一天都把時間用得滿滿的，從不早走。那時候，冀先生已近七旬，腰也有病，經常看到老人家走走停停，每天上下班都費盡體力，讓人看著很心疼，但談起工作老人家總是眉飛色舞，充滿激情。1990年前後，總目辦公室轉移到白石橋新館，離位於舞蹈學院的家近了，冀先生上班改為步行。那幾年，每天清晨一位七旬老者從舞蹈學院宿舍走走停停，到館上班，下午步履蹣跚回到舞蹈學院，幾乎成為一道令人感動的風景。之後，終於在館領導的關心下老人家可以搭專門的小車上班了，後來辦公室在周和平同志（時任副館長）的關心下又多了中午可以休息的沙發。

那時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個月工資是五十八圓，總目每年的工作經費是十萬圓，應該是充滿誘惑的數字，只要老人家簽字，很多項目可以報銷，但那時除了必要的差

旅費以外，這筆錢很少使用，使用的鉛筆要用到手攥不住了，再接上筆帽繼續用，直到今天，冀先生女兒手裏還收藏著浸潤母親手澤的小鉛筆頭。總目工作後期，為加快進度，冀先生請沈燮元先生到京工作兩年。完成工作送行時，冀先生自掏腰包請老朋友吃了一頓便飯，選擇的地方是當時剛熱炒的郭林家常菜。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卷雲舒。”對個人利益的淡泊和對事業的執著正是老人家面對困境淡然處之，戰勝困難，構建事業的力量所在。先生於版本目錄學貢獻之巨遠非筆者可以評說。先生逝於2001年4月18日，倏忽十年，僅能在祭拜中，將心中更多的感悟與朋友們分享，更希望先生的精神能夠傳遞給更多的青年人，畢竟這是屬於國圖人，屬於古籍人的精神，是冀先生留下的寶貴財富。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